

忆高成鸢先生的学术苦旅

陈鑫

接到噩耗的时候,我正在开会,手机屏幕忽然一闪,传来方博兄的微信:“高成鸢先生已于前日(2026年3月22日——编者注)离世。”方兄的导师与高先生是挚友,他正在帮助料理后事。由于高先生没有子女,夫人年迈,怕吊唁人多,无法应对,只通知了很小范围。方兄说,看到高先生去年病中与我的合影,想了想还是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。我陷入了沉思,高先生瘦削但坚毅的样子浮现在我眼前,会议的后续内容已听而不闻。

高成鸢先生是当代学界的一位奇士。说起来,他身体一直不好,中学时因病辍学,没能读大学,便到天津图书馆做了一名普通馆员。然而他并未因此沉沦。没有文凭的他,几乎靠自学,写出了许多科班出身的学院派都难以企及的学术作品,得到众多名家大儒的赞许。体弱的他,说话稍久都要喘上一阵,可求学之志让他有了顽强的生命力,最终得享九旬高龄。直到去年病中见面,聊起学问,他眼里仍时时泛出光彩。

余生也晚,2014年末才得识高先生。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天津文史界的盛会——津书院年会,散会时天色已晚,我开了车,便送几位老先生去地铁站。路上聊天,高先生得知我是南开大学的,就说起他不久前发表的《被遗忘的大教育家黄钰生》一文。黄钰生是南开办学重要的先贤,听了高先生的介绍,我立刻请求他将文章给我学习。

这是一篇全面述论黄钰生一生事业,并为其鸣不平的文章,其中也包含高成鸢先生本人的文史。黄钰生曾任南开大学秘书长,西南联大建设长、师范学院院长,是全国闻名的大教育家,后因种种原因遭不白之冤,转任天津图书馆馆长。虽然改革开放后,年迈的他获得了较高的待遇,但他当年在教育界作出的卓越贡献,长期被淹没在历史中,甚至在南开也知者甚少。而黄钰生正是高成鸢先生的伯乐。当年老馆长慧眼识珠,看到这位身体不好的馆员有志读书治学,特许他“半脱产”从事学术研究。高先生感叹,这在全国图书馆界“别无他例”。他一直视黄钰生为“恩师”,抱持强烈的感恩之心,经过多年挖掘,才写出了这篇万言长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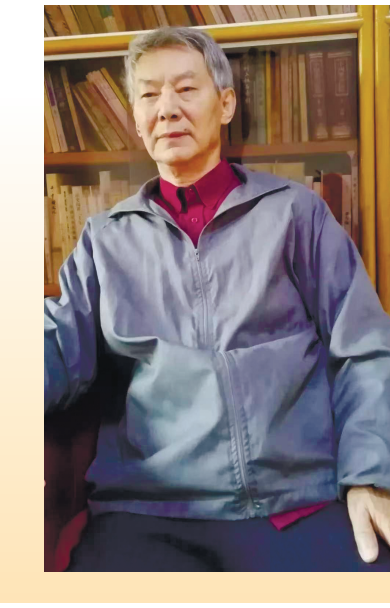
拜读之后,我通过电子邮件回信给高先生,写道:“您在文末论教育家,指出‘中



国近代的教育家不等于 educationist,而是仁人志士’,确为高论……教育工作者本身如非仁人志士,如何能培养出以天下为己任、志存高远的学生? 发人深思!”此后,我们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,了解越深入,高先生的学问人格就越让我肃然起敬。

没有高校的背景,反倒让高成鸢先生对学问的追求更加自由。他关注的学术领域非常广泛,归根到底,是追寻中华文明独特的文化基因。他晚年受聘为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,文史馆为他出版的著述专辑即名为《华夏幽境辟蹊:中华文化源头课题论集》。分科治学、高度专业化的高校学者恐怕会觉得这样的题目大而无当、不可思议;高先生长期在图书馆工作,当然也懂得学问的“分门别类”,可他却能够跨学科、跨领域甚至跨文化思考问题。

说到跨文化,让我没有想到的是,高成鸢先生治学的起点是世界语。1957年,他利用天图馆藏书籍开始自学,20世纪80年代参与创办天津世界语协会,最终成为该会的荣誉会长。得知高先生的这段经历时,我不禁错愕,当年那个几乎与世隔绝的青年,为什么会迷上世界语呢?在他的心中,似乎摒弃了现实生活的一切纷扰,完全着迷于探寻人类文明的未来与根源。或许



就是因此,常人眼中的磨难从没真正困扰他,相反图书馆的环境让他如鱼得水。同样心底澄澈而身处逆境的高钰生馆长,或许也是因此,对这位青年馆员倍加爱惜。

在宽松的治学环境下,高成鸢先生的研究逐渐深入。他经过东西文化比较,发现“尊老”在中国是比“孝”更根本的传统,进而他做了系统梳理与阐释。为此,著名学者庞朴盛赞他有“存亡继绝”之功。季羨林先生则亲笔写信向海外推荐,指出这项研究对“弘扬东方文化,振兴东方伦理,拯救世界道德沦丧”有重要意义。高成鸢先生关注的另一个题目是“中华饮食文化”,寻绎文化背后的物质基础。他认为,中国素有“民以食为天”的说法,食物问题可说是中国人的“天问”。他综合运用文献考证、文字训诂、跨文化比较、自然科学等方法,直追“味”中之“道”。国际著名的饮食文化研究专家弗朗索瓦丝·萨班称他是中国食学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。

高成鸢先生对学问的追求是持续的、执着的,每一部专著的出版,都不是思考的终止,而只是阶段性小结与新的开始。他做了许多具体研究,但他反对只注意琐碎问题,缺乏宏观视野。我与高先生相识时,他已近80岁。十几年来,我们的电子邮件和微信对话记录,差不多都是围绕他的新思考展开的,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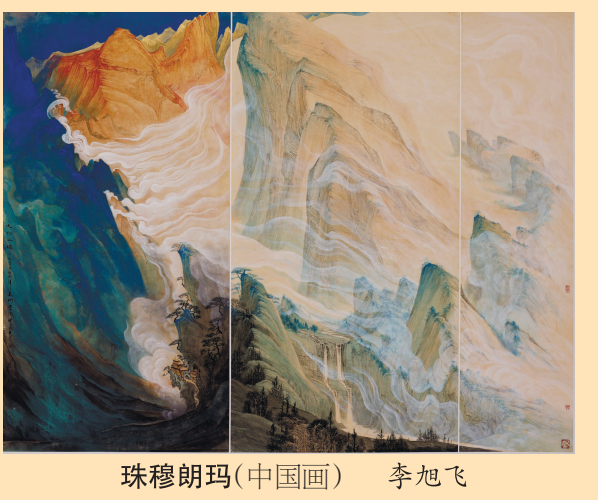
如对“水火”之道、独特的扁担文化、石的缺乏与中华文化的关系等物质与文化问题的解译。在钦佩高先生的同时,我也逐渐感到,尽管他取得了很多荣誉,可内心仍是孤寂的。他在治学的过程中得到快乐,但他更渴望与学界对话,渴望听到各种意见,哪怕是批评。可是随着季羨林、庞朴等老一辈通儒的远去,学界似乎对宏大命题的讨论逐渐失去兴趣。高先生的著作不断在名刊名社发表、出版,他期待的热烈讨论却并没有发生。

对于高成鸢先生的学问,我当然只是一个不够资格的对话者。不过,因为对文明问题也充满兴趣,所以在读到高先生的高论后,常常欣喜无似,有时便会也评论几句,甚或疑问求教。回看通信记录,有一次,我就高先生对“甘”字本意的解读提出了一点不同意见。高先生回复:“蒙直率赐教,真够朋友。”学人的纯粹与交流带来的快乐跃然屏上。我也常把自己写的文字发给高先生,请他指教,而他每次都会在认真看后加以评点,毫不敷衍。

对高成鸢先生的离世,我多少有些心理准备。他曾患重病割去了一肺,能得高寿,除了心无旁骛,主要也得益于夫人的悉心照料。高先生是乡音未改的威海人,高师母则是很细心也很热心的天津人。一生漂泊异乡的高先生得到夫人的爱护,真是令人欣羡的幸福。我自己也曾尝过高师母的手艺,朴素而别致,大虾、茄盒,据说是按威海风味“改造”后的天津菜,还有专为润肺的自制果茶。然而三年前,我去见高先生时,突然得知高师母出现了失智的症状。虽然当时高先生还醉心于学问,向我展示了他新置办的小自行车,说是每天到图书馆去查资料,但我感到深深不安。去年中秋前,我发信息说要去看望他时,他回复:“千万别带月饼,吃不动了。”见面后,看到瘦骨嶙峋的他,心中难过,再问方知高师母已无法交流。这对于高先生无疑是致命的打击。高先生是对的,文化的追求,终究离不开物质基础。

那是我和高先生最后一次面谈。他仍然有很多话想说,但已经没有力气多说了。交流时间很短,不舍却也只能匆匆告别。我用手机自拍了合影,高先生把照片发给了一些朋友。也正是这张照片,提醒了方博兄将高先生去世的消息告诉我。

高成鸢先生曾感慨:“人事代谢,老一代学人惠予我的顺境,如今已不可想象。”我想,高先生本人可能也只属于上个时代。未来还会有这样的学者吗? 还能有这样的学者吗? 他是“别具一格”的奇士,命运的开局并不顺利,可他循着自己的志趣而生,纯粹、充实。他的研究未必都能成为定论,但这些寻根溯源的终极问题值得我们不断探讨。更引人深思的是他的经历——没有“资质”的他,创造了一段学界传奇、生命传奇。



珠穆朗玛(中国画) 李旭飞

满庭芳

第五四七三期

如果为《红楼梦》的情节结构画一幅示意图,我们将得到一棵树,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。粗大的树干是情节主脉,即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,树干上生长着繁茂的枝叶,那是情节的支脉,是小说中每一个人的命运。

《红楼梦》从小说类型上来说,是一部家族小说。家族小说是以家族为主要描写对象、刻画家族内部成员之间的矛盾以及家族与外部环境的冲突、叙写家族兴衰变迁的一种小说类型。家族小说大多为长篇小说,中外文学作品中许多名著都属于家族小说,如俄罗斯作家列夫·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、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·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,中国作家巴金的《家》、梁斌的《红旗谱》,等等。

由于《红楼梦》开宗明义便说此书“大旨谈情”,所以将其视为一部爱情小说的观点由来已久。宝黛爱情悲剧确实是整部小说中最动人的存在,其思想的前卫性和深刻的历史意义,都是此前所有古代爱情小说无法比拟的;但它却不具有囊括整部《红楼梦》的空间力量,大量情节和人物游离于宝黛爱情之外。在公认为作者原著的前八十回篇幅中,宝黛交往情节仅占约二十三回。这样的篇幅占比,不足以作为整部小说的类型定位。

将《红楼梦》视为一部宿命小说的观点时有出现。小说开篇作者自云“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,故将真事隐去”,更于篇中设置“梦”“幻”情节,表达宿命观点,并且叙述的时间和空间都变得虚无缥缈。并且,整部小说情节框架建立于一个宿命环里,人物命运在第五回就已经注

定。宝玉梦入太虚幻境,看到那些判词,听到那些曲子,无不预示着金陵众多女子的人生结局,而故事情节的推进,正是一步步走向那些结局。但是,我们必须看到,虽然《红楼梦》笼罩着浓厚的宿命观雾霭,但曹雪芹倾心描述的却是他所钟爱的那些女孩儿对宿命的顽强抗争。黛玉以“质本洁来还洁去”的坚守,抗拒着“风刀霜剑严相逼”;探春因庶女身份备受封建嫡庶制禁锢,她不惜以远嫁的清醒、“才自精明志自高”的人格尊严摆脱这一枷锁;此外,香菱学诗、晴雯补裘、龄官画蔷、小红“跳槽”……众多女孩儿在对抗宿命博弈的过程中焕发出的人性光芒,才是《红楼梦》天空中最美丽的彩虹。

梳理一下我家族小说发展史,可以发现,家族小说于《金瓶梅》初露端倪,而《红楼梦》则是确立范式的开山之作,它奠定了中国家族小说的基本框架,完成了家族小说艺术从内涵至外延的拓展。首先,《红楼梦》虽然标明小说“朝代年记失落无考”,但它叙写的四大家族由盛至衰的变迁,突破了单体家族、个体原因的局限,直击时代底色,从而获得了厚重的历史感。其次,《红楼梦》彻底摒弃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单线结构的方式,它的情节结构如网络般纵横交错,各类线索巧妙编织,又

吉他与钢琴、小提琴并称世界三大乐器。仅凭六根琴弦,便可独立铺展旋律、和声与复调,无需其他乐器辅助,便可自成完整音乐天地。六缕丝弦、数品琴格,便能营造出层次丰盈的音响。正是这件乐器,在我的青年岁月里,留下了一段奇特的往事。

上世纪80年代,我收到辽宁营口一个中学生写来的一封信。少年在信中接连发问,满心疑惑:《西班牙吉他演奏初步》可是您写的? 童声合唱套曲《四季》《景颇童谣》是否也出自您的笔下? 在音乐学院执教作曲的,仍是同一个鲍元恺吗? 世间莫非有数位同名之人? 少年提到的这本《西班牙吉他演奏初步》,正是我编撰的吉他入门教程,由人民音乐出版社于1982年1月首度付梓;而这本书的缘起,要追溯到“文革”时期那段军垦农场的岁月。

1968年至1973年,中央音乐学院及其附中、中国戏曲学校、北京芭蕾舞学校三所院校六六届、六七届毕业生,受命赴北京军区天津葛沽农场劳动锻炼。繁重劳作之余,清查运动层层铺开,我和三几位同学无端被指曾经加入莫须有的“五一六反革命集团”,随即被隔离审查。此乃般委屈一言难尽,暂且搁置。说一说在这段时光里,我与吉他结缘的故事。

1970年,中苏边境局势紧张,驻军官兵尽数开赴前线,营地只余下我们这支学生连队。邻近另一连队有一位家境殷实的四川籍留守士兵,一日闲逛走进我住所,听闻我们连队是音乐学院学子,便主动搭话,随即抚弦弹奏,一曲古巴民谣《鸽子》,一曲舒伯特《摇篮曲》,婉转琴声让我陶醉。我当即拜他为师,又辗转托人在天津信托商行花费十八元,买下一把木吉他。

第一堂课,我便洞悉了吉他独有的和弦逻辑:下方三弦锁定主、属、下属三个正和弦根基,上弦铺陈和三弦,只需移动半音,便可自由切换大、小、增、减各类和弦。我一边研习这位士兵老师传授的小曲,一边为耳熟能详的外国民歌编配吉他伴奏或改编为独奏曲,乐谱写满厚数册。三次课后,他说:“还是你教我吧!”于是,师生换位。

1971年“九一三”事件之后,连队管束日渐松弛。一众未被限制自由的同窗,纷纷前来找我补习和声或求教作曲。农场没有钢琴,无法直观感知和声色彩。此时,这把六弦琴成了独一无二的教具。以吉他代替钢琴讲授作曲理论,成了那段艰苦岁月里一桩充满意趣的新鲜事。待到离开农场之时,我将所有乐谱手稿和教材手稿付之一炬,以为此生再无缘吉他。

时序迈入1970年代末,春回大地,文艺迎来复苏。1980年,电影《庐山恋》里的吉他弹唱风靡全国,这件乐器迅速成为青年一代的挚爱。彼时国内没有系统规范的吉他入门读物,市场缺口极大。1981年,人民音乐出版社得知我这段特殊经历,遂委派刘玲担任责任编辑,邀约我尽快编写出一本入门教材。此时,我已经放下吉他整整十年,所幸吉他的指法记忆格外牢固,纵然乐谱早已淡忘,只要指尖落准把位,旋律与和声便会自然而然浮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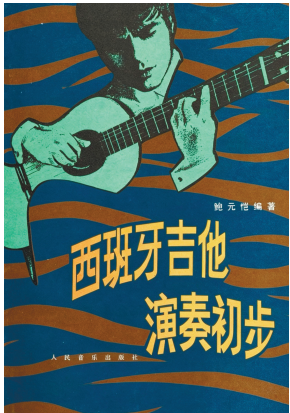
书籍在1982年正式刊印,首印两万五千册,面市便迅速售罄。出版社只好一次次加印。彼时著作权法尚未颁布,出版社没有告知印数,我也不会主动去询问。后来我在孔夫子旧书网淘到一册旧书,仅这一本的版权页就标注,累计印数已达八十五万五千五百三十五册! 盗版的规模更是无从估量。通过这本书,我亲眼见证民间翻印技艺一步步迭代:最早是手抄本、油印本,继而兴起石印批量翻刻;随后铅字制版、胶印盗版四处蔓延;复印机普及之后,各地琴行、培训班遍地都是静电复印本;电脑普及之后,盗版制品愈加“精良”。业内同行普遍估算,盗版总量绝对远超正版,但确切数字终究无法统计。

这本吉他教材意外风行全国,只是我作曲主业之外的一段插曲。早年在农场依托吉他钻研和声的积累,也让我吃透了这件乐器的音色奥妙。后来录制童声合唱《四季》中《秋日》一曲,管弦伴奏里的竖琴琶音,便是我利用吉他泛音,模拟出竖琴空灵缥缈的音色。如今留存的广播录音与薄膜唱片里,这一段竖琴旋律,正是我抱着吉他亲手录制的。

一把六弦吉他,结缘于困顿的隔离岁月,十年之后却催生了一本风靡全国的读物;原本只是借以消愁的乐器,录音片段却永久留存于唱片中,胜过我苦练多年的长笛与钢琴。一桩不入作曲正史的往事,就此落笔。

我与吉他

鲍元恺



西班牙吉他演奏初步

古今变局释东坡

——评《近代苏轼研究文献辑刊》

安鹏



近代苏轼研究文献辑刊

为文学研究的重镇,浸渐于今,百有余年,于是人人皆知有文学家苏东坡。

苏轼身后已近千年,称其为文学家,却是这百年间的新论断。称谓更迭背后,映照的是古今文章理解范式的转型。古人作文皆有宗旨,不致空疏浮泛之言,所以秦观在《答傅彬老简》中说:“苏氏之道,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。”苏轼诗文虽在集部,却不全是纯粹抒情的文字,“文学作品还是以抒情为本”的论调,正是近代研究者采纳西学之见而形成的观念定势。

本辑甄选近代珍稀文献十数种,不求其全,但择必选其精,取必审其要。开卷寓目之际,近代苏轼研究之梗概,文章范式之转型,炳然如观火。

无”为选注标准,提倡“诗歌的生命是真情实感”,与古人注诗宗旨判然有别,并由作品汇集转向体系化的文学批评,足见古今文章理解范式演进之大概。

又如《东坡和陶合笺》,原书为清中期汪汝能纂订,本书选取1925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影印,依托近代石印新工艺复刻古籍,是民国时期的全新探索,在近代国学弘扬与文脉普及方面具备独特价值。与之相仿,《精选三苏文粹》同为石印本,由上海广雅斋新书局面向全国学校发行,作为应用课本流通。这意味着,三苏策论完成身份转型,由旧时科举应试范文,蜕变为新式教育体系中的散文、议论文典范。

注解苏诗者历代不乏其人,而苏文笺

注寥寥,仅有南宋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,辅以明清数部选本点评。近代谢榕庵注《洋注东坡集》十六卷,虽非全文校注,但笺释翔实广博,汇辑历代名家评点论述,下及今世曾国藩诸家,皆搜罗完备,鲜有遗漏。另有《音注苏东坡文》《苏东坡尺牋》二书,由中华书局校勘注释,作为“中国文学精华”丛书发行。承载“性命自得”内核的苏文,正式被纳入“中国文学”现代学科体系,依托近代印刷技术革新,向全社会

广泛传播。苏轼文章跳出传统士大夫小众品鉴的圈层壁垒,成为近代弘扬国学经典、传承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。

除了诗文集本、校注典籍以外,民国时期还出现了像周景濂《苏东坡》这样通过现代学术体例撰写的研究型传记。此书是民国首部系统、完整的苏轼传记,归入正中书局“国学丛刊”中。全书总七章,

不务高深,必求醒豁,契合当时“用新的方法显示国学的各方面”的学术追求。

当然,近代苏轼研究并非一味趋新求变,传统治学亦得以赓续传承,《东坡赤壁集》便是典型例证。该书承袭传统地方文艺志编纂体例,汇辑历代题咏黄州赤壁之诗文、题跋、碑记,存录散佚文献,价值卓著。

要而言之,全书收录文献品类丰赡、体裁完备,囊括1914年至1939年间苏学核心研究成果。所收文献兼具时代性与经典性、学术性与普及性,既能展现近代苏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与学术水准,更映照出近代救亡图存的时代语境中,苏轼诗文滋养民族精神、塑造中华文明品格的独特文化价值。

打破日常的坚冰

王霞

细想下来,生活里诸多困境,皆是自己用习惯与借口筑起的枷锁。简单的选择,总要在自我设限中反复纠结。

下午三点半,踏上山道,背包里装着清茶与零食。清凉山风穿过衣领,吹散行走的燥热。我忽然觉得这身运动衣穿得很郑重。脚下的石阶蜿蜒向上,像一条挣脱惯性的引线,牵着我一步步脱离往日的惰性轨迹。腿有点酸,每踏出一步,都似乎要挣脱某种无形的黏带。不过,心情却无比轻盈,连山间回荡着的随性的歌声,都让我觉得鲜活有趣。

下山后,先生驾车出停车场,停车费1.5元,这说明我在山上停留了一个半小时。

一时兴起的出行,恰似一把凿子,悄无声息地凿开了日复一日的惰性坚冰,让一成不变的生活裂开一道缝隙。这1.5元的停车费,于我而言,便是一枚别致的小勋章,记录着这次勇敢打破常态的美好尝试。

午后阳光正好,临时起意想去爬山。先生听了特别高兴,赶紧做各种准备。

熟悉我的人都知道,我其实是很宅的一个人。现在天南海北地跑,是因为有先生拽着。只要回到南京,我就窝在家里不动了。对此,先生很是不赞成,可面对我的懈怠,他也可奈何。

换衣服时我打趣,并非不愿出门,只是嫌换装麻烦。先生忍不住“惹”我,原始人都不穿衣服。虽然是一句玩笑,我听后却不由得信马由缰,思绪飞扬。

人类最初穿衣,只为御寒护体、谋求生存。可渐渐地,衣物被赋予了更多意义。《礼记》有言,衣冠服饰用以区分尊卑贵贱,自周代起,服饰形成严格规制,颜色、款式皆有等级划分。“先敬罗衣后敬人”,服饰慢慢成了身份的标签,成为人际交往里第一重评判。

时代变迁,穿衣也愈发讲究。从前衣物缝补再三反复穿用,如今上班、运动、居家、入眠各有专属衣橱,穿衣演变成生活的仪式感。于我而言,换装更是一道无形门槛;在外沾染尘垢,回家必须换衣,也绝不肯身着家居服出门,这既是恪守分寸,也是尊重自己与他人。这份讲究慢慢化作慵懒的借口,让我愈发不愿迈出家门,大小杂事也习惯托付给先生。也正因如此,我主动提议爬山,于他而言想必很是意外。

曹雪芹「种树」

宋安娜



洁上丛话

如大树的枝杈互相连接,互相生长,创造了古代小说结构的最高级形态。再次,《红楼梦》的人物塑造扬弃了传统小说人物描写扁平化弊端,敢于如实描写,并无掩饰,跳出从前的小说写好人完全是好人、坏人完全是坏人的传统窠臼,以人性的犀利和温暖揭示人物性格内在心理逻辑。鲁迅先生在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一文中说“自有《红楼梦》出来以后,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”,这个论断至今仍值得我们不断深挖体悟。

必须说明的是,论《红楼梦》为中国小说史上家族小说的开山之作,论据和结论,范围只界定于小说类型的范畴,并不界定小说主题与思想内核的深度。正如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孙伟科先生所言:“《红楼梦》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,不仅是一部书写家族兴衰与人性悲欢的文学经典,更是一座蕴含哲学思辨、美学精神与文化密码的宝库。”《红楼梦》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。二百多年前,曹雪芹种下的大树,仍在荫庇着后世中国家族小说的成长,在巴金的《家》和老舍的《四世同堂》中,都能觅到这棵树的影子,当然,那应该是另一篇文章去阐述的内容了。